

## 第二章 青海湖祭的演變

### 第一節 青海湖周邊的地理概況

青海位於青藏高原的北方，在大陸中心偏西的地方，西有阿爾泰山、北有祁連山、南有唐古喇山、成爲新疆、甘肅、西藏、四川的天然分界線，東西長約 1200 公里，南北寬約 800 公里。青海長期被視作偏遠地區，主要是因爲遠離海岸線，平均海拔在 3000 公尺以上，屬於高原大陸性氣候—寒冷乾燥、冬寒夏涼、多強風、太陽輻射強烈、晝夜溫差大、氧氣稀薄、山脈交錯、沙漠廣布其間。境內 5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大多終年積雪不化，且呈西北—東南走向，所以全省地勢由西北向東南逐漸傾斜。青海由祁連山、崑崙山兩大山系及柴達木、可可西里、民和、共和四大盆地構成，以日月山爲界，大致分爲東部農業區、環湖牧業區及玉樹果洛高原區，其中，東部爲暖區，環湖爲次暖區，青南爲冷區。

青海湖，位於青海省東北部大通山、日月山及南山之間，地理座標爲西起東經 99 度 36 分，東至東經 101 度 46 分，南起北緯 36 度 32 分，北至北緯 37 度 15 分，面積爲 4473 平方公里，湖東西長約 109 公里，南北寬有 65 公里，繞湖一周約有 360 公里，<sup>1</sup>平均水深在 19 公尺以上，湖面海拔有 3195 公尺，<sup>2</sup>是大陸地區最大的內陸鹹水湖。（附圖四：青海湖濱地區圖）但由於自然環境的變化及人爲影響，青海湖地區正面臨一連串生態惡化的問題，包括湟魚產量減少、水位下降等，因此，青海湖現正分裂爲高原的湖泊群，湖面面積現爲 4200 平方公里，東西長約 106 公里，南北寬爲 63 公里。<sup>3</sup>青海湖流域，在周、秦及兩漢時期，是羌人所居住的地方；南北朝、隋唐時代則爲吐谷渾、土蕃所佔據；以後則爲藏人

<sup>1</sup> 青海省剛察縣志編纂委員會，《剛察縣志》（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7），頁 113。

<sup>2</sup> 吳尙平，〈青海湖的傳說〉，頁 41~42。

<sup>3</sup> 楊雪，〈對青海湖裂變成湖泊群的思考〉，《青海社會科學》，2004 年第 3 期，頁 27。

所居住。青海的居民中，藏人比蒙古人多，大多集中在黃河流域上游。

青海湖的湖岸線並不曲折，湖岸很淺，湖水具有鹹味，<sup>4</sup>湖水中的鹽分使湖水表面呈現深藍色，湖岸有廣大草原，是良好的牧場。周圍的小島也養育了相當多的飛禽，在湖的西北方有一個狀似飛鳥的島嶼，即相當有名的「鳥島」，又稱為「蛋島」，每年四、五月份有許多種類的鳥類來此棲息及繁衍後代，把面積僅 0.11 平方公里的小島擠得黑壓壓一片，蔚為奇觀，也成為當地有名的觀光景點。青海湖草原不只為野生動物和鳥類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也對人類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它的高海拔使這裡的夏日不若其他地區嚴熱，且冬天不下雨，這些因素構成了一個良好牧場所必備的條件，所以一直以來，青海湖高原成為遊牧民族的爭奪之地，清代，黃河以北的蒙古人及以南的藏人一直為爭奪環湖草原的豐盛水草而紛爭不息。

青海湖的北岸與南岸的山緊挨著湖邊，東岸和西岸的山稍離湖邊有段距離，而群山與湖岸之間的狹小地帶是極好的草原，有戈壁地區的特點，但又不同於戈壁，因為這裡的水量較為充沛，草原上的氣候和動植物的種類都與鄰近的流域有所不同，包括有黃羊、鼠兔、鵝鵝、野驢，這些都可以稱得上是荒漠中特有的品種。據當地人說，青海湖的湖水一般多在 11 月中旬結凍，到次年 3、4 月融化，每年將近有快半年的時間，湖面是被冰給覆蓋住。青海湖裡盛產湟魚，也稱「無鱗魚」，雖然無鱗但魚刺特別多，近年來由於湟魚的數量逐漸減少，所以當地現已有限制的開放捕捉。<sup>5</sup>

近年來，由於強烈的西風為青海湖帶來了塵土與沙子，讓青海湖逐漸變淺，湖泊的面積也逐漸地變小；沒有黃土覆蓋的低矮低地，以及沿著湖邊逐漸顯現出的淺沙灘和小湖，都足以證明青海湖的確慢慢干涸的事實，夏天時，這個內陸湖

---

<sup>4</sup> 筆者也曾經淺嘗湖水，確是很鹹，推測是內陸湖泊的進水量小於蒸發量，故湖中的鹽礦成分相對增多。在筆者前往當地觀察時，青海湖地區已變成一個觀光遊憩的好地點，當地政府有計畫的規劃並圈地作為野鳥的保護區，而每年五、六月時，大量鳥類聚集加上該時該地氣候宜人，故總能吸引國內外的人前來旅遊。

<sup>5</sup> 根據當地官員表示，雖然對青海湖中的湟魚有限制捕捉的政策，但似乎無法斷絕偷捕的行為。而筆者走訪青海湖濱（屬剛察縣管轄行政區劃），發現沿岸還是有相當多的商家進行販賣，在保育及生計間的平衡似乎也考驗著當地官員的智慧。

有約數十條的河流注入，其中只有兩條的河水流量較大，即西邊的布哈河及北邊的哈爾濟河，其餘的河流經常乾涸，只有在雨季時才会有微量的水注入青海湖中，青海湖水的蒸發得不到補充。<sup>6</sup>盲目地開採資源也導致青海湖的草場逐漸沙化，曾經是水草豐美的草原，現在已經逐漸出現沙地，漠化的範圍逐漸擴大，甚至於已向湟水谷地移動。而陸地面積的增多，也造成每年到此繁衍的鳥類減少，甚至於死亡，這也相當不利於青海湖的生態。

在清代方志中只要提到青海湖，都稱其為水草肥美的大草原，生態環境也保持著良好的狀態，松巴·益西班覺曾記載道：青海湖地區四周群山環抱，草地遼闊，夏季茵茵綠草，美麗地覆蓋大地，五彩繽紛的鮮花像寶石般鑲嵌在其中，湖四周的山溝峽谷湧出水晶般的清澈湖水，各種動物在湖濱草原上出沒，湖中成千上萬的魚類、水牛在游泳，湖畔也棲息著許多鳥類。<sup>7</sup>但近二十年來，由於改革開放的政策使得青海湖牧區的面貌開始改變，為青海湖地區的生態環境帶來了嚴重地影響，由於青海湖是鹹水湖，營養性很低，湖中所盛產的湟魚十年才長一斤，生長期很漫長，為保護它們不至滅絕，青海省已於 1979 年到 1980 年、1986 年到 1989 年實行「限額補撈」、「封湖育魚」，<sup>8</sup>其間雖有成效，但在封禁期間，青海湖畔還是出現了滅絕性的濫捕狂潮。這是值得重視的問題。

## 第二節 湖祭的神話傳說

青海湖對青海當地人來說是相當重要的湖泊，也是他們引以為傲的湖泊，不管明代或清代，青海湖都對當地居民的生計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關於青海湖的形

---

<sup>6</sup> 科茲洛夫著，陳貴星譯，《死城之旅》（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193。

<sup>7</sup> 松巴·益西班覺著，謝健、謝偉譯，〈青海歷史（二）〉，《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1期，頁42。

<sup>8</sup> 周國洪，〈社會縱橫命運：湟魚和青海湖的故事〉，《民族團結》，1995年11期，總294期，頁21。

成有幾種傳說，其一：相傳龍王有四個兒子，老大、老二與老三分別管理東海、南海與北海，老四無海可管，故龍王命他前往造海。他一路駕起祥雲在西北地區上空俯看，見到此處樹木稀少、黃土裸露、赤地千里，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於是他化身一名老者到處打聽，原來這裡一年都下不了多少雨，連供應飲水都有困難，更別說還要引水灌溉，所以沒有收成，於是老四仔細一想：「我何不在此造海，既可造福人民又可以向父王交差」。於是施展法術，引來 108 條江河之水，造就了西海，即現今之青海湖。<sup>9</sup>雖然我們現在知道青海湖水因含有鹽礦而無法飲用，但青海湖中盛產的湟魚、及周圍沿岸所生長的植物、還有湖水所培育出的牧地，都為當地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幫助。這故事可以讓我們了解青海湖對於當地人的重大意義，並在經濟生活中有著極大的幫助，讓該地成為青海廣大土地中水草豐富的宜牧之地。

其二：藏族的傳說指出青海湖原來是海心山（今奎蘇島）上的一口神泉，它有用刻有咒語的石板封住泉水口，當地牧人飲用泉水後，都必須要將石板重新蓋好。一日，藏王松贊幹布的兒子喝完泉水後，不慎忘了封口，剎那間泉水噴湧不止，立刻淹沒了大批的草原與無數的牛羊；為了救人民逃出困境，蓮花生大師使用法力，搬來了印度「瑪哈德哇」大山的山頭，壓住了不停湧出的泉水，而噴出的泉水就形成了今天的青海湖，壓住泉水的山頭就變成了今日的海心山。<sup>10</sup>這個傳說我們可以看到它被賦予藏傳佛教的色彩，筆者推測可能從拉薩建造大昭寺的傳說<sup>11</sup>之一而來，雖然在本篇傳說中，人物的時代有些矛盾，即蓮花生大師的時代晚於松贊幹布的時代，但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民間傳說中創造出的箭垛式人物<sup>12</sup>有關，也就是連結傳說和該族的偉大人物之間的關係，讓本來不相干的傳說變得

---

<sup>9</sup> 吳尚平，〈青海湖的傳說〉，頁 41。

<sup>10</sup> 那巴，〈青海湖的傳說和崇拜〉，《中國西藏》，1995 年第 2 期，總 28 期，頁 56。

<sup>11</sup> 傳說內容大致是拉薩的藏人填湖建造大昭寺，以鎮壓湖中羅刹魔女的傳說。

<sup>12</sup> 傳說的起源，除了接收神話的基型加以演化外，也有部分傳說形成初期是以真人真事為依據，後來常常把與該人物相似的事件都附會在他身上形成，由於民間故事常是經由民眾口頭傳頌，沒有確定的時間，也沒有確定的時間。故事的主角常是平凡百姓，沒有確實、特定的姓名，不過有時為了製造虛擬的真實感，也會特別選用真實的有名人物，形成箭垛式人物，讓人們在信以為真的情境中造成奇幻的效果，正如林惠祥所說的：傳說不是要說明甚麼，只是要敘述大家共信為確曾發生的某種事件。

更具意義，以蒙古為例，成吉思汗就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可能會有一些傳說故事本來和成吉思汗並無關係，但後來卻演變成發生在成吉思汗身上的傳說故事。而松贊幹布是有名的藏王，爲了賦予青海湖更特別的意義，因此連結青海湖與松藏幹布之間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出青海湖在當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由於藏人是青海湖地區的原住民，青海湖養育了世世代代的藏人，所以，藏人藉由藏傳佛教中的人物結合當地的傳說，來彰顯出對藏傳佛教信仰的虔誠，也讓青海湖成爲自然崇拜中的重要環節之一。

其三：很久很久以前，人們在拉薩修建一座佛寺，儘管修廟的人很虔誠、很努力，但廟總是修不好，只要每隔一段時間廟就會被破壞的面目全非，怎麼查都查不到原因。於是，有一位喇嘛預言說：在遙遠的東方住著一位聖人，他知道廟爲何修不好的原因。所以，想要把廟修好就必須找到這位聖人並向他討教，被派去尋找聖人的喇嘛在所有寺廟及城裡尋找，花了整整一年卻無所獲。有天，在西藏和內地交界的地區，他遇到一位不起眼的盲人老者，偶然地提起這座修不好的寺廟，老者說：這是因爲在廟址的下方深處，有一個廣大的湖泊，所以廟一直修不好。老者並請喇嘛要保密，因爲一旦被發現這個秘密，那個廣大湖泊的水就會湧到這邊來，把他們都淹死。喇嘛得知了這個秘密之後，立刻趕回拉薩，告知這個消息，當天晚上，一聲巨響後，大量的水從地底湧出，淹沒了整個高原，很多牲畜和人都死了，最後，上天發了慈悲，派了一隻巨大無比的鳥，讓它在南山上抓了一塊巨大無比的石頭扔在出水口，堵住了水，讓水不再外流，而淹沒的高原就變成了湖泊，那塊巨石就變成了湖中的小島。<sup>13</sup>

其四：在藏族的信仰中，宇宙分爲三部分，上面是白色的天，是神的世界；中間是紅色的大地，那是「贊」和「念」的世界；下面是藍色的水域，住著龍和龍的家族，所以青海湖是龍的世界。<sup>14</sup>傳說中水神的個性是極爲粗暴的，要是不

---

<sup>13</sup>（俄）普爾熱瓦爾斯基著，王嘎、張友華譯，《荒原的呼喚》（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頁257~258。

<sup>14</sup> 那巴，〈青海湖的傳說和崇拜〉，頁56。

小心觸怒了祂，立刻會招來惡運，所以必須要時常祭湖以保持水源充足、五穀豐收、六畜興旺，也能抵抗病蟲害。故有清一代，生活在青海湖周遭的蒙、藏民族先後一直有祭海的習俗。

其五：很久很久之前，青海湖邊住著一些蒙古人，那時候在現今青海湖的位置有兩個小池塘，住在附近的居民很不愛惜清澈的池水，常常將池水弄得很髒。有天，一位婦女直接在池塘裡小解，因此住在水裡的黑麒麟再也無法忍受，他從水底的龍宮鑽出來，站在水面上，他所經過的地方就形成了一個窟窿，而水也就不斷地從這個窟窿向外湧，最後淹沒了周圍數百公里的地方。驚慌失措的蒙古人和鄰近的漢人立刻去祈求木匠的庇護神「魯班爺」的指示，希望祂能救他們，魯班爺向黑麒麟叫陣後，命令他回到自己的龍宮，黑麒麟自知法力不足以相抗，便立刻退回龍宮。後來魯班爺將山搬到湖裡，用山來堵住出水的窟窿，自此之後，池塘的位置就形成了廣大無際的青海湖，而堵住窟窿的山則變成小島，也就是今日青海湖的樣貌。<sup>15</sup>這個與蒙古人相關的傳說，其實帶有相當濃厚的漢人色彩，同時也帶有漢人信仰的特色，與當地藏傳佛教的信仰有一些不同，所以推測產生的年代較晚，並受到後來漢人移入而流傳下來。

我們可以從以上幾個傳說中看出，有關青海湖的傳說大部分與藏人有關，與蒙古人相關的傳說較少。可見，在青海湖周圍及附近，藏人是較蒙古人更早到青海湖周圍定居的民族，所以能夠發展出比較多與青海湖相關的傳說。古代藏人所信仰的原始宗教為苯教，直到西元七世紀，佛教傳入西藏後，吐蕃人民才逐漸接受並信仰，並形成一特殊的藏傳佛教，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原始的信仰和儀式，後來在藏傳佛教中形成了諸多派別，所以經由佛教寺院所保存的珍貴文化遺產，以及由寺院所發展出的一套教育，都對藏人有著超乎我們想像的影響。所以在藏人居住的地區中，會將藏傳佛教融入到周圍山川地物的傳說中，以彰顯他們的信仰。

---

<sup>15</sup> 科茲洛夫著，陳貴星譯，《死城之旅》，頁 190。

在以上許多有關青海湖的傳說中，流傳較為普遍的還是龍王之子引江河之水造西海的說法，由此可見，不管那一個民族，面對山川湖泊萬物不可解的部分，還是會對於帶有崇拜的心理，並將之神靈化，而加以尊敬。

### 第三節 湖祭的過程

先秦時期，青海湖就是羌人心中的神聖之湖，歷代都對此湖相當重視。漢代更將其列入「四海」之一，稱為「西海」，但對四海只有祭祀而無封號；對四海的封號則始於唐代，唐玄宗天寶十年（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北海為廣澤王、西海為廣潤王；<sup>16</sup>宋代仁宗慶曆元年（西元 1041 年），繼續加封「西海」為「通聖廣潤王」；<sup>17</sup>元承宋制，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又加封西海為「廣潤靈通王」；<sup>18</sup>明代，則對封號有不同意見，明洪武三年（西元 1370 年），朱元璋為此下詔：

為治之道，必本于禮，岳鎮海瀆之封，起自唐宋；夫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受命於上帝，豈國家封號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依古定制，並去前代所封名號，……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帝躬署名於祝文，遣官以更定神號，告祭。<sup>19</sup>

歷代以來，對於山川江海的祭祀都是採取遙祭的方式，對西海也是如此。正規的祭海始於清代。

<sup>16</sup> 《(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第二冊（台北：鼎文，1976），卷 24，頁 934。

<sup>17</sup> 《(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第四冊（台北：鼎文，1978），卷 102，頁 2488。

<sup>18</sup> 《元史》第五冊（台北：中華書局，1965），頁 14 右。

<sup>19</sup> （清）張廷玉，《明史》，台北：鼎文書局，1975，卷四十九，頁 531。

這種對於海濱的遙祭，也就是通過敬神的具體儀式，將統治者的意念轉化成爲神的意志，再將神的意志轉變成人（統治者）的意志，透過人與神的合一達到獻祭與祈禱的目的；祭祀一方面要表現出神祇，另一方面也要表現出自我及宗教主體。<sup>20</sup>

清代繼歷朝之遺俗，對山神、海神會舉行大規模的祭祀活動，每逢重要節慶，均遣官致祭全國各名山大川及湖海，漸漸成爲慣例。據史書上記載，從清初到康熙年間，照例致祭名山大川，也派員致祭西海，時有召集青海蒙古各部首領會盟，宣揚皇上仁愛之心，從政治作安撫的手段。<sup>21</sup>「會盟」原是蒙古族各部共同商討、制定決策的政治活動，青海蒙古的「會盟」制度是在固始汗統一蒙古各部之後，沿用蒙古的舊制，所建立起的。蒙古歷來一直有崇拜山川神靈的習俗，故清廷很自然地將祭海及會盟兩者結合起來，當時青海湖東岸的察罕托羅亥（白頭山，今共和縣境內）以其地位適中，遂成爲會盟之地。當時的會盟、祭海皆爲本民族首領主持，清政府沒有派人參加，故缺乏史料記載。<sup>22</sup>自雍正元年，青海羅布藏丹津反清之後，清廷開始重視這件事情，爲了籠絡蒙古上層及行使監督權，中央會派員參加並組織這項活動，使其不斷被加強而能爲清政府的統治服務。

祭海，就是祭祀青海湖神，這活動原是統治階級所發起的一項祭祀活動，在平定羅布藏丹津反清後，清代將歷代以來的遙祭改爲到湖邊致祭，而舉行這種儀式是清廷爲了控制青海蒙、藏人的一種手段。雍正二年（西元 1724 年）2 月，岳鍾琪大敗羅布藏丹津的主力，俘虜其母親及姐妹，並迫使羅布藏丹津逃亡準噶爾，後岳鍾琪上奏曰：

大軍注賊黨阿喇布坦溫布等，追至諾爾北岸伊克哈爾吉河，時人馬甚渴，求水不得，忽有泉從營前湧出成溪，士馬就飲，得不困，眾歡呼奮勇，

<sup>20</sup> 石葵，〈祭祀西海神考析〉，《青海社會科學》，1997 年第 3 期，頁 77。

<sup>21</sup> 齊木德道爾吉、黑龍、寶山、哈斯巴根、任愛君編《清代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下）》，頁 1149、1187。

<sup>22</sup> 聿一之主編，《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頁 209。



逮獲賊首，督臣以青海效靈奏聞，詔封青海之神。<sup>23</sup>

清軍以此奉承中央，用此來證明他們的軍事行動得到了神靈的幫助、是正義的，而清廷之所以借題發揮，原因跟統治者的立場相同，都是爲了政治上的需求。雍正四年（西元 1726 年）三月，清廷敕封青海水神爲「靈顯青海之神」，<sup>24</sup>並派官員到湖邊立碑致祭，建立碑亭一座，<sup>25</sup>這塊祭海石碑高 150 公分，寬 74 公分，厚 14.5 公分，碑的正面兩邊豎刻盤龍紋飾，自左向右爲滿、蒙、漢文三行、三體雙色陰刻豎文，文爲「靈顯青海之神」六字，另一面豎行陰刻「雍正四年九月吉旦立」九個漢字，左右兩邊分刻滿、蒙兩種文字。<sup>26</sup>此爲清代官員在青海立碑修亭並派大員主持會盟、祭海之始，也是近祭青海湖儀式的開始。

清初以前，青海的祭海與會盟，就地方民族而言，是青海蒙古人單一舉行，兼有政治、宗教、民事及文藝等內容，<sup>27</sup>蒙古人一向有舉行那達慕活動的悠久歷史傳統。清政府統一東、西蒙古之後，由官方定期召集組織，一年或三年舉行一次，但青海蒙古不專門舉行此項活動，而是在舉行祭海時同時舉辦。雍正二年（西元 1724 年），規定一年會盟一次；乾隆十二年（西元 1747 年），改爲二年會盟一次；隨著青海蒙古的臣服，到了乾隆二十八年（西元 1763 年），改爲三年一次。在《清高宗實錄》中記載：

查西寧向係一年一次會盟，後經都統眾佛保奏請，改爲二年，青海蒙古等游牧地方，距會盟處遠者頗多，如改爲三年，事體並無貽誤，蒙古等亦可省往返費用，……至三年會盟之期，開列在京侍郎、副都統、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職名具奏，恭候欽派，馳驛至西寧。由西寧出口，令

<sup>23</sup> 張穆，《蒙古游牧記》，卷 12，頁 248。

<sup>24</sup> 《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卷 42，頁 2。

<sup>25</sup> 張穆，《蒙古游牧記》，卷 12，頁 248。

<sup>26</sup>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八）青海湖志》，頁 287。

<sup>27</sup> 韓官卻加，〈簡述青海之祭海與會盟〉，頁 97。

彼處總兵、道員照會盟例所需賞項、筵宴、緞匹等物撥發，派官兵隨往。<sup>28</sup>

至此，青海蒙古族的祭海與會盟，雖在次數上有所減少，但在形式與內容上都較前有所發展，已經具有相當的規模了。

蒙古面對清廷的統治，剛開始難以忍受，特別是每年的會盟對他們而言是一大負擔，所以有些王公開始拒絕參加。雍正九年（西元 1731 年），曾有一王公諾爾布（Norbu）離開了清廷分配的牧地，不加入會盟；另也有數旗遷徙，逃離官府的控制，這樣的行為在清廷眼中是不允許的。所以清廷制定了新法「番例條款」，<sup>29</sup>特別規定會盟固定在農曆的七月十五日，地點在青海湖東岸，所有旗的首領都必須參加，由政府指派的專使監控，不得私下舉行，不出席者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之後，在會盟的場合中也會討論該如何懲罰違規的相關事宜。

清乾隆三十八年（西元 1773 年），西寧辦事大臣伍彌泰上奏：「青海龍神應請每年致祭，嗣准（經）禮部議准，每年秋季致祭一次，太常寺頒發香帛，陝甘總督委道、府一員陪祭」。<sup>30</sup>於是四瀆（指的是東海、西海、南海及北海）典禮始全，後相沿成例。蒙古舊俗，以四月融雪時為喜慶之時，多有婚嫁之事，宴慶之會，因此，早期的會盟多於春天舉行，且有祈福消災、求得一年牧業豐收及人畜平安之意；另外，待冰雪融化後的春天也較為方便。但自清廷派大臣主持會盟後，則改於秋間舉行，沒有固定日期，但不會晚於中秋節之後，後相沿成例。<sup>31</sup>清廷也明確規定，蒙古各首領不得私自祭海與會盟，必須要在清廷官員的主持、監督之下進行，各札薩克、王公也必須親往，無故不到者，罰俸三年。

<sup>28</sup>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六百八十，頁 28~29。

<sup>29</sup> Uradyn E. Bulag 著、張永儒、藍美華譯，〈青海湖祭：民族關係與儀式政治〉，《中國邊政》，2004 年 12 月，第 160 期，頁 69。

<sup>30</sup> （清）長白文孚，《青海事宜節略》，頁 7。

<sup>31</sup> 乾隆時推崇神道，定七月十五日，派大臣到青海湖濱主持祭海與會盟。引自半一之主編，《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頁 184。

祭海的地點從清代到民國以來，共有三處：沙陀寺、克圖埡豁和察罕城。<sup>32</sup>其中克圖埡豁遺址已無存，沙陀寺位於剛察縣泉吉鄉西南 6 公里的年乃麻索，察罕城（又稱察汗城），遺址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倒淌河鄉北約 12 公里的山下，是諸環湖遺跡中保存較好的古城遺址。

嘉慶年間，牧區不靖，賊番擾掠，焚其亭而碑遂孑立；嘉慶九年（西元 1804 年），因克圖埡豁碑亭被毀，因此，副都統都爾嘉將碑移至察罕托羅亥，歲設祭品而遙寄之，欲建廟而未果。<sup>33</sup>此時，青海蒙古人的勢力已日漸衰微，祭海與會盟遂流於形式，有名無實，斷斷續續。道光三年（西元 1823 年），陝甘總督那彥成<sup>34</sup>建築察罕城置兵戍守，由於清廷無法將完全將藏人自環湖草原驅逐，所以，清廷只能承認環海的藏人也能參加蒙古的祭海與會盟。

清道光十一年（西元 1831 年），恒敬任西寧辦事大臣，對祭海及會盟重新重視，同時他也感到「兩成祭禮，而終以廟宇未修，神靈無所式憑為戚，爰出俸廉，鳩工庀材，為殿三楹，安設神位，自夏徂秋，厥工始竣」。<sup>35</sup>道光十二年（西元 1832 年），海神廟建成於察罕城北，從此祭海典禮在海神廟內舉行。光緒三年（西元 1877 年），清廷賜海神廟「威靖河湟」的匾額，地方官員在西寧城西門外修建廟宇一所，懸掛此塊牌匾，作為西寧鎮、道、府、縣官員春秋祭祀之所，<sup>36</sup>後因年久失修，風雨侵襲，海神廟倒塌，同治、光緒年間改為設帳而祭之。

光緒二十八年（西元 1902 年）起，祭海與會盟由西寧辦事大臣主持，而由蒙古王公札薩克陪祭，祭畢會盟，致祭不到者，罰俸三年。光緒三十三年（西元 1907 年），西寧辦事大臣慶恕為了便於再度召集青海蒙古王公與藏族千百戶祭海與會盟，再度捐款修築海神廟，此次建於青海湖東；次年完工，該廟正殿三楹，

<sup>32</sup>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八）青海湖志》，頁 291。

<sup>33</sup> 鄧承偉、基生蘭，《西寧府續志》，卷 9，頁 619。

<sup>34</sup> 那彥成，字繹堂，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乾隆 54 年進士。性好學，工詩能書，遇事有執，持於權要，人無所屈，勦辦川、陝、楚及滑縣教匪尤有功，任總督時三次考績皆特旨優，死後謚文毅公。嘉慶中，有英吉利入貢，頗不恭順，惟問福中堂及那大人見居何官，蓋外夷所夙所敬憚者祇此兩人云。引自繆荃孫纂錄，《續碑傳集》第二冊（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卷 9，頁 14、17。

<sup>35</sup> 鄧承偉、基生蘭，《西寧府續志》，卷 9，頁 619。

<sup>36</sup> 畢一之主編，《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頁 211。

廟門與其他房屋七間，殿門上題有「海神廟」三字，正殿牌坊上寫有「青海勝境」四字，並將「靈顯青海之神」之石碑移立於大殿之中；自此之後，這裡成爲祭海的場所，會盟處則選在日月山以東的東科爾寺；民國時期，海神廟及石碑屹立原處，直到 1944 年後，石碑被砸，牌坊傾倒，廟宇也被拆除。<sup>37</sup>

宣統元年到民國元年（西元 1909~1912 年），由於政局不穩，祭海的典禮曾一度中斷。民國建立之初，祭海與會盟的沿習並未因此而被廢除；民國二年（西元 1913 年），青海辦事長官廉興爲了籠絡蒙古王公及藏族千百戶，並勸說其承認共和，因而到湖主祭，同時由西寧總兵馬麒<sup>38</sup>陪祭；在這次祭海會盟後，青海蒙古王公與藏族千百戶代表赴蘭州晉見甘肅總督張廣建，並進一步與北洋政府取得聯絡。此後，祭海儀式仍照常舉行，但祭海時，將原有「皇帝萬歲萬萬歲」的牌位換成「中國民國萬歲」的牌位，仍行跪拜禮，這是在民國時期的祭海新典禮。此後，祭海典禮時斷時續，直到民國十六年（西元 1927 年），甘肅省政府主席劉郁芬爲安定寧海地區局勢，派教育廳長馬鶴天主持祭海時，才將跪拜禮改爲鞠躬禮，並撤除聖旨，正如馬鶴天在《西北考察記》中所言：

祭時在正殿外階上，行三獻禮，以前尚用跪拜，此次余主張改用鞠躬，先後各三鞠躬，……案上尚有假聖旨，黃緞包裹，馬使謂蒙藏民族，畏敬此物，但余仍主張下次一律免除。也分送孫中山先生像讓蒙藏首領攜回。<sup>39</sup>

當時，馬鶴天曾指出：

祭海，本爲前清治理蒙番民族的一種方法，年派欽差大臣，與蒙番頭目

<sup>37</sup> 《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64~65。

<sup>38</sup> 馬麒素與甘肅省和青海地區的部分蒙藏首領有往來，也曾勸說他們響應共和，也曾派其弟馬麟前往黃河南北、瑪沁雪山等處，勸說藏族各部落承認共和。

<sup>39</sup> 馬鶴天，《西北考察記》（台北：南天書局，1936），頁 21~22.24。

會面，施以賞罰，使其畏威而懷德，但久之成為具文，現在亦覺不宜，途中與馬使談，主張祭海之舉，不如廢去，將來每年按期召集王公千戶等會議一次，討論交通教育實業等行政進行計劃，庶有實益，馬使亦深以為然。<sup>40</sup>

由此段對話我們可以得知，中央對於青海祭海的典禮完全是籠絡的態度，只是在需要的時候拉攏青海蒙藏民族，並非想要認真地經營當地。而馬鶴天也了解民國成立後，蒙古王公制度的存在，讓青海蒙古人民無法擺脫於王公專制之下，所以處處受到壓迫，造成社會發展嚴重地落後。<sup>41</sup>

民國十八年（西元 1929 年），青海省政府成立，省主席孫連仲派民政廳廳長前往海濱致祭，1930 年秋，青海省政府第一次派員參加祭海；民國二十一年（西元 1932 年），當時日本欲侵佔東三省，又覬覦內蒙，中央爲了鞏固西北地區的局勢，決定派大員來青海主持祭海，因此，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呈請行政院撥款派員來青海主持祭海，認爲若不繼續進行此項活動，恐蒙藏民族不復知有中央政府之存在；在這樣的情況下，正好適合派員前往視察，也可以順便宣導政令，期讓政治得以順利進行。<sup>42</sup>

同年 9 月 9 日，國民黨政府蒙藏委員會奉行政院命令，派蒙藏委員會總務處處長陳敬修爲監視祭海專員，電請青海省政府轉蒙古王公與藏族千百戶等，定於 9 月 20 日在察罕城舉行祭海。陳敬修一行攜帶大量禮品及相片，9 月 13 日從南京出發。後因陳敬修從南京到青海路途遙遠，察罕城又地處偏僻，故未能如期到達，但參加祭海之蒙藏首領隨員眾多，怕糧草供應不足，無法久待，故只延至 9 月 23 日舉行，並由當時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主持，國民黨政府西安綏靖公署代表仲興參加了祭海儀式。祭海儀式完畢後，所有人馬聚集西寧等待陳敬修，陳

---

<sup>40</sup> 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頁 27。

<sup>41</sup> 馬鶴天，《西北考察記》，頁 74。

<sup>42</sup>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八）青海湖志》，頁 289~290。

敬修一直到 9 月 29 日才抵達西寧；10 月 1 日，陳敬修在歡迎會上報告來青的目的，並宣揚中央的政策，隨後，並訪問了蒙、藏各部的首領、各寺院的呼圖克圖、大喇嘛及黨政首領等，也參加了回教促進會等機關團體的歡迎會，也到了青海湖東南沿岸等地。<sup>43</sup>陳敬修回南京後，主張應該要在軍事及政治上加強對青海的控制。<sup>44</sup>

在青海省政府成立前，每到要籌備祭海典禮時，都是由湟源縣承辦，省政府成立後，青海湖的東南增設共和縣，青海湖東南屬共和縣管理，但爲了籌辦順利，每次祭海的準備工作還是交由湟源縣承辦。

1932、1934、1935 年，南京政府都曾派人致祭（附表一：蒙藏委員會派員赴青海監視祭海專員經費表），而馬步芳主持省政時，每次祭海都會親自主持，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及籠絡蒙藏各部領袖，祭海與會盟的規模都不斷地擴大，又以 1940 年秋的那一次盛況空前。民國二十三年（西元 1934 年），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行政院代院長宋子文一行到青海湖祭海。民國二十五年（西元 1936 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邵元冲代表國民黨中央到陝西祭拜皇帝陵，祭後轉往青海，並於五月抵達，專程到青海湖祭海。<sup>45</sup>民國二十九年（西元 1940 年），蔣介石爲了籠絡馬步芳及蒙藏民族，派國民黨中央派蘭州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到青海主持祭海，中央撥了專款五萬元交由青海省政府備置禮品饋贈蒙藏首領，朱紹良也私人捐贈了萬餘元，青海省政府也撥了三萬元，準備相關用品。

當時馬步芳爲了事前的準備充份，購置了大量的茶、酒、糖果、香煙、蒙古包及帳房，派民夙日夜趕工修整前往海濱的祭海道路，也通知了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戶及湟源各界的人士，前來參與。農曆七月十四日，朱紹良及其隨行官員，由馬步芳陪同從西寧前往察罕城，一行五十多人，分乘大小車輛，浩浩蕩蕩而來，蒙古王公與藏族千百戶則是在離海兩公里左右處，夾道歡迎，鳴放鞭炮，演奏藏

<sup>43</sup> 青海省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歷史紀要》，頁 346~347。

<sup>44</sup> 陳敬修，〈奉派赴青海省監視祭海慰問蒙藏人民經過報告書〉，刊於《蒙藏月報》。

<sup>45</sup> 青海省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歷史紀要》，頁 347。

樂，由剛察千戶為代表，獻上了哈達，約午後到達了海濱。十五日清晨，祭海典禮開始，祭品共有牛 2 頭，羊 8 隻以及糖果等，祭海程序為奏樂、鳴禮炮、升旗、三鞠躬、讀祭文，禮畢，將活羊趕入海中獻祭，並將祭品全數拋入海中。<sup>46</sup>

隨後，召集蒙古王公及藏族千百戶會盟，由朱紹良發表講話，強調要精誠團結、服從政令，並舉行「敬酒」儀式。再將當地的特產：駿馬一百匹、綿羊數百、麝香及鹿茸等貴重物獻上，朱紹良也回贈茶、酒、糖果及絲綢等中央所準備之禮品，當時馬步芳暗示蒙藏首領應於會後贈送其駿馬等物品，當晚，在察罕城舉行了盛大的歌舞表演來慶祝這一切。<sup>47</sup>自此之後，祭海活動逐漸衰微，一直到西元 1949 年後，祭海就停止了。筆者認為由於當時國內外環境都十分地混亂，而中國也正遭遇對日的八年抗戰中期，國軍整個退守到大後方，不管是物資、環境都處於艱困的時期，對於祭海恐有心無力。因民國時期的祭海儀式皆為中央舉行，地方配合，中央一但無力舉行，地方也不會有所行動，因祭海的儀式對地方經濟宅說是一大負擔；另外，1949 年之後，更因為大陸主張無神論，對於神靈及偶像崇拜都不允許，所以祭海的活動因此而中斷，再無發展。至於，在 1940 年到 1949 年間是否有祭海儀式的舉行，筆者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並無所獲，所以並無有力證據證明是否曾舉行，筆者認為其間若有舉行，一並能夠找到些微的資料可佐證，但一直未有尋獲，推測 1940 年有可能是最後一次舉行祭海儀式，不過此點也尚待證明。筆者於 2004 年七月前往青海時，聽到當地旅行社有安排祭海的行程，可見祭海活動在這幾年已轉變為觀光旅遊的行程之一。

青海蒙古早期祭海是沒有固定地點的，一直到雍正三年（西元 1725 年）才定在察罕托羅亥之西北的海濱，修廟立碑設祭，有時也會在察罕托羅亥遙祭之。嘉慶九年（西元 1804 年），西寧辦事大臣才正式將碑移至察罕托羅亥地方，察罕托羅亥是位於青海湖東五十公里處的小山包，是日月山的支脈，為日月山至青海湖之要衝。道光三年（西元 1823 年），那彥成平番順利後，在其山包下築城設戍

---

<sup>46</sup> 陳邦彥，〈“祭海”沿源和一九四〇年的祭海情況〉，《青海文史資料選輯》第八輯，頁 59~60。

<sup>47</sup> 陳邦彥，〈“祭海”沿源和一九四〇年的祭海情況〉，頁 60。

守，才稱其為「察罕城」，後也在此祭海與會盟。光緒三十三年（西元 1907），重修海神廟於該城之北。在馬步芳統治後，祭海與會盟的地點，就移至東南岸邊的群科加拉地區，原廟址即廢棄不用，後也有在日月山及湟源東科爾寺等處，設壇遙祭，聚眾會盟，總而言之，自廟毀碑壞之後，祭海與會盟就沒有固定的地點，主要由主祭者酌情選定，但多半不會遠離青海湖太遠。

察罕托羅亥距西寧市 104 公里，在倒淌河以北的山坡上，蒙語的察罕意為「白」，托羅亥意為「頭」，因為此山頭上常有白雲，所以又稱為白頭山；坡上築有一城，即為察罕城，察罕城俗名「白城子」。據《共和縣志》中載：城東西長 420 米，南北寬 365 米，東西各有一門，殘牆高 3 米、寬 3 米，城外西北方 100 米處有海神廟遺址，但建築已蕩然無存，該城可以算得上是祭海諸城中規模較大、保存較好的遺址。以前的碑亭在什麼地方已無從考證起，有人說在離察罕托羅亥向西 20 多公里處，有座小城名為會亭子，就是當年祭海的地方，不過此點並無充分的證據顯示。<sup>48</sup>

祭海與會盟的地點從乾隆三十八年（西元 1773 年）制定後，時間也改為秋間致祭，在農曆的七月十五至二十三日間舉行，一般多是在中秋節前的農曆七月之間。祭海儀式由簡而繁，日益慎重。青藏高原的七、八月間，特別是青海湖畔旁，天氣涼爽，氣候宜人，可說得上是高原氣候的黃金時期，所以利用這段時間舉行祭海與會盟也是相當適合的。

祭海會盟的日子，呈奏中央批准確定之後，開始派人整修祭海會盟的場所，並通知將要參加的祭海者作準備，祭海最早為中央政府派官員舉行的一項祭祀活動。但在蒙古人進入青海之後，清政府為了統一控制及拉攏當地的蒙古王公，於是，將祭海與會盟兩者結合，祭海與會盟的主持者，從雍正以後清廷派大臣，由西寧辦事大臣主祭，陝甘總督批准的西寧總兵陪祭，蒙旗中參加者也僅限於青海蒙古各旗王公札薩克。道光年間，那彥成為了整頓蒙古事務並統一政令，也指定

---

<sup>48</sup> 青海省文史研究館文物藝術組編，〈祭海與會盟〉，手抄本，藏於青海省圖書館，1957 年，頁 2。



藏族的千百戶要參加，之後，青海藏傳佛教中的呼圖克圖及環湖寺院的活佛也參與。民國初年，附近的回、漢民族也有參加。<sup>49</sup>

參加祭海與會盟者，除了中央特派的官員之外，還包括地方各級官員，以及青海蒙古左右兩翼正副盟長及所屬二十九旗之札薩克、親王、郡主、貝子、鎮國公、輔國公及其隨員、青海各呼圖克圖與附近寺院的活佛、喇嘛，藏族的千百戶及其隨員、駐軍軍官、部隊等。一般以中央特派官員為主祭，地方官為陪祭；自民國以來，多有地方官為主祭，中央特派官員為陪祭。會堂正上方，設有牌位、獻供品，主祭的官員、陪祭者坐在中上席，蒙古王公居左，藏族千百戶居右，以地位之高低，唱名而入，席地而坐；在民國二十一年前，藏族千百戶入宴不設座，之後由於提倡民族平等，藏人也入宴共餐。<sup>50</sup>

明代祭西海時，設供「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八、簠~~黃~~各二、酒尊三、帛一、樂用雅樂，其儀先期一日」，<sup>51</sup>清代除了供應牛、羊、豬各一、五色糧食及各種糖果三十二品之外，還包括龍旗兩面、御仗四根、長哈達一條、蒙藏漢三種字體書寫的祭文一份、紅燭兩枝、香及酒等。後來因為主祭及參加者漸有穆斯林，所以便將祭品中的豬用羊來代替。<sup>52</sup>

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祭海儀式，但歷代的統治者所懷抱的政治性目的是一樣的，清代祭海儀式的程序主要為：

- 一、全體起立；
- 二、主祭者就位；
- 三、奏樂迎神；
- 四、唱歌稱頌；
- 五、向皇帝牌位行三跪九叩禮；
- 六、宣讀聖旨；

---

<sup>49</sup> 韓官卻加，〈簡述青海之祭海與會盟〉，頁 101。

<sup>50</sup> 韓官卻加，〈簡述青海之祭海與會盟〉，頁 101~102。

<sup>51</sup> 胡廣，《明太祖實錄》（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三十八，頁 6。

<sup>52</sup> 聿一之主編，《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頁 213。

- 七、致祭：包括進香、進帛、進祭文、讀祭文、全體向海神行跪拜禮等；
- 八、鳴炮，最後禮成。<sup>53</sup>

在民國年間，祭海又有新的改變，祭海儀式如下：

- 一、全體肅立、
- 二、主祭者就位；
- 三、奏樂；
- 四、唱黨歌；
- 五、向黨及總理（孫中山先生）行三鞠躬禮；
- 六、主祭者恭讀總理遺囑；
- 七、致祭：包括進香、進帛、進祭文、讀祭文、全體向海神行三鞠躬禮；
- 八、望、燎（望祭、燎祭：即向湖肅立凝望，並點燃祭壇前的兩堆篝火）；
- 九、放炮（除在祭壇前點燃爆竹、岸邊點燃火藥炮之外，在湖中有兩艘羊皮筏子，由槍手朝天鳴放火藥炮）；最後禮成。<sup>54</sup>

禮畢，將活羊趕入海中，祭品全部投海，隨後召集蒙古王公及藏族千百戶講話，通常祭海儀式完畢後，都會舉行一系列的文藝娛樂活動；次日，舉行會盟宴會，早期會盟宴會是在祭海地方，臨時設帳舉行，道光後改在察罕城內舉行，清末以來，則多在東科爾寺的大經堂內舉行。

從清代與民國的儀式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民國時期多了唱黨歌一項活動，可能是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爲了收服民心，所增設的一項儀式，希望增加蒙藏民族的向心力；其他像跪拜禮改爲三鞠躬禮、恭讀聖旨改爲恭讀總理遺囑則是因改朝換代而作的微幅改變，祭海不再只是清廷統治下的活動，清滅亡、民國建立之後，祭海儀式也成爲政府控制青海民族的一項工具。

清末民初，會盟宴會規定：一年大宴，一年小宴，反覆輪流。逢大宴的年份，入宴者座前設點心、糖食及酒菜，每桌湯羊二隻，還設一些細緞衣料、禮帽、茯

---

<sup>53</sup> 韓官卻加，〈簡述青海之祭海與會盟〉，頁 102。

<sup>54</sup>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八）青海湖志》，頁 289。

茶、小刀、手帕、火鏟、鼻烟壺等物，這些物品均按入宴者地位高低來擺放；<sup>55</sup>逢小宴的年份，在入宴者座前只設肉菜一碗，不設湯羊，其餘供給如同大宴，<sup>56</sup>入宴就座前，由中央大臣傳達中央政府的政令，接著地方官訓話，並代表地方官員向中央大臣敬獻各種禮品、哈達、敬酒，接著舉杯稱賀，讓各蒙古王公與藏族千百戶共同祝酒開宴進餐，酒過三巡，宴畢。

宴畢後，入宴者將座前物品傾囊而去，參加所謂的「搶宴」，即在正宴完畢後，另備大量手抓牛羊肉、糖果物品，抬到室外，由司儀者高喊「搶宴」二字，與祭者立刻衝向前爭奪食品，而搶到食物者，可望獲得一年的吉利。在「搶宴」之後，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戶則到指定地點參加會盟，一般民眾則各自收拾所得物品，到海神牌位前頂禮謝恩而去；接著，蒙古王公由盟長帶領謁見中央大臣，並報告一年中所發生的糾紛事件及王公病故（出缺）呈請襲職等要事，大臣根據情況作出判斷，能立即處理的予以處理或會後討論，並預定次年各王公朝貢覲見等事項，最後，中央大臣當面提醒蒙古王公及藏族千百戶嚴約所屬，安靜住牧，勿任意滋生事端，並領回朝廷所贈之物品，各歸牧地。<sup>57</sup>

#### 第四節 湖祭的性質與功能

青海的祭海與會盟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青海地處偏遠，地域遼闊，居住的地方相當分散，交通也不便利，加上當地統治階級的限制，所以當地的民族很少能與外地的民族發生聯繫，因此，要召集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戶集會一次，實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當時的中央統治者卻巧妙地利用崇拜的手段，將祭海與會盟結合起來，來實現清代會盟撫邊的計畫。祭海的目的就是為了會盟，而會盟又可

---

<sup>55</sup> 韓官卻加，〈簡述青海之祭海與會盟〉，頁 103。

<sup>56</sup>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八）青海湖志》，頁 287。

<sup>57</sup> 聿一之主編，《青海蒙古族歷史簡編》，頁 215。

收到羈縻人心，加強邊治，進而達到長治久安的效果。清代的中央統治者，通過祭海會盟的手段，派代表視察邊疆，充分了解並掌握邊疆民情，並向蒙藏上層貴族安撫，互贈禮品，藉以收攏民心，從根本上起到穩定政局、維護統治的目的，所以，儘管祭海的活動是耗費大量人力與物力的活動，但中央政府從其中所收到的效果卻是無可計算的。

會盟時，召集蒙古王公、藏族千百戶及當地軍政的要員一同開會，以盟、旗、千百戶為單位，匯報這一段時間內所發生的大小事，如所轄地區的施政及治安，並報告所轄地區內所發生的糾紛事件及其處理結果，最重要的是聽取中央特派大臣及地方行政首領對他們的具體佈署及安排，以及中央統治者對他們的具體政策及要求；並懲罰那些因為管理不善及有違中央指令的王公及千百戶；獎賞那些善於管理部眾並有功於中央政府的王公及千百戶。中央特派大臣處理部落內部或部落與部落之間所發生的糾紛時，通常都必須要收取大量的罰金，所以這些大臣能夠從中得到很大的獲利，常常是滿載而歸。

青海由於交通不便，每當祭海與會盟時，往返就需要十餘天，在沿途所需之車輛、馬匹及所運送的物資，甚至是為大臣或王公、千百戶服務的人民，常多達數百人，而這項差役必須由湟中、湟源的農民輪流來分擔，所以對他們而言是一項相當沉重的負擔，稱為「海差」，讓當地的民眾怨聲載道。以祭海的經費而言，過去一直都是由西寧的人民負擔轎車三輛、大車三十輛，其餘由湟源的人民負擔，廚師備席二十桌、屠戶備羊二百頭、縣府招待草料等等，對眾人而言都是相當大的負擔。在民國二十七年以前，也規定歲支一萬五千元，由省庫負擔，自青海省成立後，祭禮改由省府購備。<sup>58</sup>

祭海與會盟除了維護中央體制的統治，並給人民帶來繁重的負擔之外，它其實也提供了一個有利的管道，讓本民族與它民族之間能夠有相互來往與了解的機會。道光年間自蒙藏共同會盟開始，蒙藏間對牧區所有權的直接衝突和糾紛也大

---

<sup>58</sup> 魏明章，〈青海的祭海〉，《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青海分冊）上》（蘭州：甘肅省圖，1986），頁 228。

為減少，所以對青海地區的穩定與發展，具有一定的作用。透過異民族間的交往，也間接的促進了彼此之間的經濟交流，並增強了民族間的聯繫，增強了民族間的影響及了解，為後來的地方政權打下了基礎。另外，趁著舉行這種大型聚會的機會，各地的商賈都會前來，與當地許多民族交流，也促進了民族貿易的發展，並通過不斷地引進新文化、新技術、新的生產工具及方式，加強了與內地之間文化的聯繫，有利於青海地區的發展與建設。青海的蒙藏人民自古以來以游牧為業，為了便於生產，居住的相當分散，以這樣的形式集會，也有利於蒙藏人民間特色文化的交流及發展。

祭海會盟的儀式持續了兩百多年，祭海過程中可以分為幾個步驟，筆者認為其中有三個較具代表性的改變：

#### 一、清雍正二年（西元 1724 年）

祭海會盟的主持者由青海蒙古的首領轉換成為中央派欽差大臣主持，也收回了對蒙古的行政任命權（指派盟長）及司法權（處理糾紛），等於宣告了清廷將青海蒙古在青海的實權收回，由中央直接控制，確實地掌握青海地區，使青海蒙古人喪失了在青海地區的權力。

#### 二、清道光三年（西元 1823 年）

自那彥成查辦番案之後，雖然青海藏人越界的行為稍受限制，但清廷允許藏人加入湖祭與會盟，等於間接承認藏人的政治地位，貶抑青海蒙古人的地位。青海藏人的地位不再像清朝初年一樣，必須處於蒙古人之下，作蒙古人的奴隸；這也表示蒙古人再也無法恢復以往對藏人的權力，蒙古社會的衰敗可見一般。

#### 三、民國年間

祭海會盟承襲清制，管理蒙藏已有專職機構，所以祭海會盟變成拉攏蒙藏民族的一種手段，不再像清代一樣有真正的作用，在祭海會盟的典禮上，中央趁機宣傳政令，擴大政治影響力，起到羈縻的功用。

清代與民國祭海儀式的程序主要如下：

清代祭海儀式	民國祭海儀式
全體起立；	全體肅立
主祭者就位	主祭者就位
奏樂迎神	奏樂
唱歌	唱黨歌
向皇帝牌位行三跪九叩禮	向黨及總理（孫中山先生）行三鞠躬禮
宣讀聖旨	恭讀總理遺囑
致祭：包括進香、進帛、進祭文、讀祭文、全體向海神行跪拜禮等	致祭：包括進香、進帛、進祭文、讀祭文、全體向海神行三鞠躬禮
鳴炮，最後禮成	放炮，最後禮成
祭畢舉行搶宴及會盟	

從這兩部分的儀式看來，大致上內容都沒有太大的變化，除了改朝換代之外（如灰底所示），其餘的儀式都是承襲舊制。但仔細一看，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清代或民國的儀式都以中央政府作為主體，在祭完青海湖神之後，接下來就是向中央政府致敬，祭海本為蒙古舊習，但演變為定制之後，反而是為中央政府行使控制權；在《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中言：這樣充滿政治性的儀式，是為掩飾既定統治程序的一種詐術，它遵循了既定的遊戲規則，就是為了追求邊際效應，而詐術的欺騙部分就在於要使規則看起來是固定不變的，並將這些規則置於各種角色之中，以便協調不同的角色及利益。<sup>59</sup>雖然祭海對蒙古人而言是信仰崇拜的儀式，但經過羅布藏丹津事件後，清廷巧妙地將其轉變為自身政權所服務的一項機制，讓青海蒙古看似既得利益者，實際上卻喪失了原來的權力，成為被統治的一方。

清廷作為統治者，同時也代表著神所護佑的一方（岳鍾琪上奏青海湖神顯靈），對青海蒙古人而言，祭海儀式作為一項典禮，雖然延續了蒙古人會盟的精

<sup>59</sup> 克利福德·格爾茲著，趙丙祥譯，王銘銘譯，《尼加拉：十九世紀巴厘劇場國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 147。

神，但本質上的意義已然改變，它演變為中央的一種工具性的符號，祭海會盟代表中央政府願意展現民族意識的一種方式，所以儀式的呈現也會朝這目標前進，久而久之，它會變成國家精神的延續，不再為蒙古人服務，而蒙古人也在不知不覺中受到這股力量的影響，進而為國家的主權服務，清廷就能達到以政治性的儀式來化解青海蒙古的力量，並將祭海改變為中央政府控制青海民族的一項利器。

